

·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

新时代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索^{*}

冯 霞 简智荣

【摘 要】文化和科技融合对文化发展的赋能与挑战并存，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认识文化和科技的相互关系、正确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提供了理论指引。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发现：在一般历史发展中，文化和科技有机统一、相互促进，这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历史中，科技与资本共谋，科技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使文化商品化、技术化，文化和科技呈现对立性，这是文化和科技融合需要警惕的风险；实现文化和科技对立的消解，不能简单化对待技术，而是要洞察技术所处的生产关系，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在共产主义历史前景中实现文化和科技的有机统一，这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正确方向。据此，新时代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要实现文化和科技的双向赋能与协调发展，要规范和引导文化和科技融合中的资本参与，要坚持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社会主义方向。

【关键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新时代 文化和科技融合 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冯霞，法学博士，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简智荣，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6）01-0005-17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哲学研究”（23&ZD033）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①文化和科技融合一方面为文化发展提供数智化赋能,驱动文化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信息化转型,极大激发了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催生诸多新型文化业态,为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另一方面又使文化发展衍生泛娱乐化、技术化和人文价值缺失等问题,给新时代文化建设带来新挑战。针对这些新挑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②等要求。面对在文化和科技融合中赋能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必须科学厘清文化和科技的相互关系,探寻实现文化和科技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正确融合道路。

关于文化和科技的关系,一部分思想家将二者对立起来,担忧技术对文化领域的介入可能引发文化危机。例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现代技术“祛魅”了世界的精神力量,其结果是“诸神的逃遁,地球的毁灭,人类的大众化,平庸之辈的优越地位”;^③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直言,技术垄断了文化,“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④另一些思想家则反对将文化和科技对立起来,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技术手段,直至我们这个时代为止,始终是人类文化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未与文化彻底脱离”;^⑤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提出媒介技术的进化和补偿的思想,认为新的媒介技术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⑥相信技术发展在总体上对文化发展起着积极作用。中国古代的儒家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7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6、27页。

③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页。

④ [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8页。

⑤ [美]芒福德:《机器的神话(上):技术与人类进化》,宋俊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⑥ [美]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译者序”,第7页。

与道家则跳出以上对立抑或统一的争论，在“道”与“器”的关系中把握文化和科技的关系，强调要以人文之道或自然之道统摄技术、工具等器物之用，认为在工具理性和无限欲望主导下的技术将呈现巨大破坏性。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正确道路，必须厘清以上理论分歧，科学揭示文化和科技的内在关系及融合之道。对此，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提供重要指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②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化和科技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中，文化和科技的关系表现为对立抑或统一是二者所处的社会历史关系影响的结果，并且文化和科技的关系是历史的、发展的，不能脱离具体历史对以人文统摄科技泛泛而谈。如果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就无法找到处理文化和科技关系的正确道路，所以必须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地、具体地把握文化和科技的关系，在二者关系的历史演进规律中寻找文化和科技的融合之道。

一、在一般历史发展中文化和科技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经历了从一般理论到具体化的发展历程。在一般历史唯物主义层面，马克思、恩格斯系统论述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科技发展的社会变革作用、文化和科技的本质等原理，揭示了文化和科技看似独立，实则在实践中一体推进、相互作用、有机统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正是基于文化和科技发展中的这种统一性：科技创新能够深刻形塑文化发展形态，文化价值则能够引领科技发展立场和科技应用方向，并且文化和科技越发展，二者的相互作用就越明显。

（一）文化和科技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统一性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科技既以工具形式作为劳动资料而构成生产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②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页。

要素,又以思想、理论、经验等观念形式作为精神财富的文化而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共同构成社会上层建筑。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看,科技与文化在总体上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进步。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视野中,文化和科技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内在统一性,绝非相互割裂的两个系统,二者统一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作为科技应用成果的机器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①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产生了对劳动工具的需求,从而推动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进步又反过来提升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运用科技改造自然,将自在自然改造为“人化自然”,创造“人化自然”过程中的精神产物则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也就是说,科技发展与文化发展构成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实践的一体两面,科技发展以技术落地彰显着人类实践水平的提高,文化发展则展现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二者相辅相成。并且,文化发展与科技发展相互渗透、高度统一,既不存在脱离一定技术载体的文化,也不存在脱离一定文化指引的科技。文化的发展伴随着作为其表现方式和载体的科技手段的演进,而科技的发展伴随着与之相应的科学知识体系与科学文化的发展。

文化和科技的立足点与最终归宿都是现实中的人。马克思指出,科技的应用在本质上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②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转化为改造自然的能力。作为人类机能的延伸,科技提升了人的实践能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并为人类的解放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科技由人创造,最终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③而文化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文化即人化,是人按照自己的内在尺度创造的对象性世界,人在这一对象性活动中确证自己的本质。文化的最终目的指向人的本质的复归,“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归宿。由此看来,文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1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和科技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最终又作用于人的本质的实现。在迈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中，文化和科技将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交汇与统一。

（二）科技发展是文化形态跃迁的强大动力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 科技的工具形式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工具与中介，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资料范畴来理解，科技构成了精神文化发展的物质生产基础。科技的发展为精神文化的生产创造了前提：在原始社会末期，农业灌溉、冶金、纺织等生产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实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② 科技发展水平影响着精神文化发展程度，精神文化作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的“人化自然”，离不开科技手段这一重要工具和中介的作用，科技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方式，进而影响人类对精神世界的建构。例如，在科技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③ 自然宗教意识便由此而生。

科技变革作为物质生产力的重要突破，不仅引发了物质生产方式的深刻调整，而且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最终作用于文化形态的发展演变，这可以从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两个方面的变迁理解。从形式上看，文化总是通过一定的技术形式表达自身，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文化的表现形式与技术外观。具体而言，文化经历了从语言文化、书面文化、印刷文化到电子文化、数字文化等的形态演变，这种演变正是造纸术、印刷术、广播、电视、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进步的结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推动文化建设的数智化赋能和信息化转型，这正是顺应新时代以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而提出的要求。从内容上看，不同技术形态不仅导致文化在传播规模、生产效率、呈现形式等方面的差异，而且带来了人类思想文化内容的重大变迁。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变成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① 其中的机理在于,一定时期的精神文化反映了该时期的物质生活状况,“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② 技术变革推动物质生产方式的调整,进而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与社会结构,促使人类的思想观念发生转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握这一基本原理,既注重文化技术形式的数智化转型,也注重数智化时代的文化内容建设,做出“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③ 等一系列部署。

(三) 文化发展对科技发展具有引领推动作用

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④ 这表明文化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一方面,文化发展对科技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其一,文化交流互鉴有助于科技成果的积累和保存。马克思、恩格斯以腓尼基人为例指出:“由于他们被亚历山大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他们的大部分发明都长期失传了。”^⑤ 在文化交往有限的历史条件下,科技成果常因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而中断或湮没,使科技发展受到阻碍。而在文化交流互鉴特别是科学的交流互鉴中,科技成果得以广泛传播,这样“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⑥ 科技发展得以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其二,思想文化的解放为科技发展创造条件。近代资产阶级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封建神学的思想束缚,使人的理性得以高扬,为近代科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文化环境。相较而言,古代中国某些视科技手段为“奇技淫巧”^⑦ 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可能实现的革命性突破。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6、2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页。

⑦ 《尚书正义》卷11《泰誓下》,《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6页。

另一方面，文化对科技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其一，属于文化范畴的科学为技术创新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引。科学以理论和实验研究为路径，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构建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既为技术创新提供理论支持与知识基础，又以自身的突破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先导。而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属于观念形态，本身就归属于文化范畴，它的发展水平制约着科技发展水平，它的研究方向与突破方向影响着科技发展方向，最终对科技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其二，文化为科技发展提供价值引领。科技绝不只是谋利的工具，而是推动人的解放的重要力量，马克思强调，要“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①这表明，要对科技应用施以积极的价值引领。文化规定了科技发展中人的尺度，必须通过先进的文化赋予科技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科技向善。基于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科技法治、伦理、诚信、安全建设”。^②

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历史中文化和科技呈现对立性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资本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剖析，使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一般深入到具体中。在一般历史进程中，文化和科技具有统一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历史中，科技日益表现为同文化相对立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资本批判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具体，揭示了文化和科技相对立的根源在于科技应用所处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像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在于技术原罪。

（一）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和科技对立性的生成

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科技曾经发挥了推动文化解放的作用。资本主义大工业“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③具体而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变革瓦解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冲击了封建思想文化，推动了人类思想文化的解放。在此基础上，民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

自由、理性、科学等现代文化价值得以逐步确立。文化解放又为科技创新注入了强大动力。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西方逐步破除了封建神学的束缚,张扬理性和科学精神,推动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一系列突破,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技的这种文化解放作用存在局限性,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由这种作用催生的资本主义现代文化渗透着工具理性、功利化等资本逻辑,“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①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人文价值的衰落和文化的异化。在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极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却是劳动者文化贫困的加深,“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②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和科技的对立性在悄然滋长。

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确立,科技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从反抗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转变为维护资本主义自身统治的工具,即由一种文化变革力量转变为一种文化统治力量。此时,科技介入文化领域的最终目的在于消解文化的批判性和超越性,使之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在此文化和科技的对立性展现无遗。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视角,通过资本批判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与科技相互“勾结”的共谋关系,基于此认识我们才能正确阐明文化和科技对立性的根源。科技是历史的、具体的,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科技表现为与文化相对立的力量是其在特定社会中应用的结果,而非源自技术原罪。马克思强调,“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③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科技才表现为同文化相对立的力量,就连科技在现代的迅猛发展也是科技与资本合谋的产物,“资本不停地、直接地塑造了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它也是由后者塑造的”。^④因此,文化和科技矛盾的化解之道在于反对资本主义,而非简单地拒斥技术。不过也要注意,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和科技的对立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而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3页。

④ [加]罗伯特·阿尔布瑞顿:《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与解构》,李彬彬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的，资本主义在扭曲与阻碍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同时，在客观上对二者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一定历史阶段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进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文明在总体上的进步，从而对文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并且为共产主义社会文化和科技发展统一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准备。

（二）资本化的科技同以人为尺度的文化具有对立性

马克思区分了科技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揭示了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才是文化和科技对立的根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资本批判具体剖析了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如何导致文化和科技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可以支配一切，科技的应用也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① 资本通过榨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实现增殖，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则减少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增加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强化了剥削。在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一方面，人沦为实现资本增殖的机器的附属物，自主性被剥夺，被贬低为物。而文化的本质是“人化”，人是文化发展中的根本尺度，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将人物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技必然与以人为根本尺度的文化相对立。另一方面，科技“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② 科技成为延长劳动时间的手段，侵占人的自由时间，而自由时间恰恰是从事文化创造的基础条件之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指出，“如书、画，总之，所有与艺术家所进行的艺术活动相分离的艺术品。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只能非常有限地被运用”。^③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文化的资本化尚不充分，因而马克思未能进一步阐述文化工业的问题，但其资本批判为理解文化工业提供了理论基础。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这决定了作为资本增殖手段的科技一旦被运用于文化生产领域，其应用方向就绝不会是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是将文化转化为商品，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2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0页。

资本宰制从物质劳动领域扩展至精神劳动领域、从生产领域延伸至消费领域。文化与资本化的科技相结合，催生了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它生产高度同质化的文化商品，取代了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文化创作；鼓吹消费主义，以娱乐至死的虚假满足替代文化沉思，使本应具备批判性和超越性的文化降格为庸俗化、娱乐化的文化。

（三）作为拜物教的技术主义与人文危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被资本化，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在物质生产层面将人贬低为物，使文化生产成为商品生产；在深层次意识结构层面，形成技术主义，使人们深信科技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将技术思维无差别地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使技术理性侵入文化领域，造成深重的人文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社会问题都有被技术化的倾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合理化”过程表明了这一偏向，通过这一过程，“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① 波斯曼则进一步以“唯科学主义”的概念描绘社会中的技术主义倾向。^② 唯科学主义忽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将自然科学方法滥用于研究人类行为，以技术思维组织、管理社会，并滥用各种“软技术”。这种技术主义实际上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在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中得到理解，是资本主义的技术拜物教。

对作为机器体系的科技的崇拜是技术拜物教的初级形态。马克思指出，拜物教在本质上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③ 即物背后的人的关系被遮蔽了。科技是人的劳动的对象化，科技在生产中只是转移劳动力通过体力劳动与精神劳动创造的价值，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科技作用于资本增殖，取得了自动生产这一虚假外观，人的创造力被物化为机器体系的生产力，由此人们陷入对机器体系这一物的迷信，精神文化中人的尺度反而被日渐削弱。对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的崇拜则是技术拜物教的高级形态。马克思指出，“知

① [德] 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9 页。

② 参见 [美] 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6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0 页。

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① 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一旦被资本化，人创造的科学就服务于资本增殖而与人相对立，并成为组织社会的原则反过来统治人。创造科学的人的精神劳动与创造剩余价值的人的物质劳动被遮蔽，科学取得了能够实现财富增长、社会进步的虚假外观，人们陷入对科学的崇拜，坚信使用科学方法能解决所有问题，依据科学原则组织劳动生产、进行社会管理乃至知识生产，科学变为在资本支配下对人进行抽象统治的异化力量，并被应用于人文文化领域，使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日益丧失。

三、在共产主义历史前景中文化和科技走向和谐统一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一般到历史具体的理论考察，可以发现文化和科技本身是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下才走向对立。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科技发展成为文化繁荣的重要基础，文化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强大动力，科技发展与文化繁荣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达成高度统一。要正确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实现文化和科技的和谐统一，就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向共产主义历史前景迈进。

（一）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文化繁荣和科技发展达成高度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② 这揭示了科技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根本性角色转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作为人类劳动对象化的产物，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反过来统治人，不仅与人的物质劳动对立，而且与人的精神劳动对立，使文化成为商品。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亡，科技复归对象化劳动的本质，成为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马克思指出：“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③ 一方面，科技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文化创造提供了物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1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基础；另一方面，科技发展能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时空基础以及富有创造性的主体。同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文化摆脱了资本的控制，真正成为人类的自由个性的表达，服务于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并在激发人的创造力、推动科技创新上发挥积极作用。由此，文化和科技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真正的高度统一。

文化和科技在共产主义社会达成高度统一绝不只是一种理想描绘，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和科技的对立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随着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与生产力的发展变得不相适应，科技发展日益激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创造了现实基础。共产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旧体制中生长而来，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社会继承了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物质生产力，为文化繁荣和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又扬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公有制，由此文化和科技不再是少数人的统治工具，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正是在人的解放这一共同旨归中，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①当前，我们正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积极迈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在这一决策部署指引下，以科技创新赋能文化发展，以先进文化引领科技向善，实现二者双向赋能、协调发展，正是迈向共产主义社会文化和科技统一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坚实一步。

（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现文化和科技对立的消解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文化和科技高度统一，这一前景的实现路径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人民共享文化和科技发展成果。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还是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加速技术批判，抑或以波斯曼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批判，它们在面对现代技术引发的精神异化与文化危机时都忽视了技术应用所处的生产关系，只是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技术本身。因此，其解决方案往往带有拒斥现代技术的浪漫主义色彩，无法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和科技对立的超越。马克思早已强调，“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① 因此，要解决文化和科技对立的问题，就要从生产关系变革着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现的文化和科技的统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由无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即科技作为物质生产资料由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掌握。人民对科技的共同占有消解了其资本增殖工具角色，使之复归本质，成为人发展自身的重要手段，与追求人类解放的文化达成统一。“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② 在人民对科技的共同掌握基础上，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幻象的技术拜物教被消解，文化发展摆脱物化意识和商品逻辑的宰制，回归以人为根本的尺度，与科技发展共同促进人的解放。二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③ 即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成果由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在资本主义分配制度下，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科技作为资本增殖工具越是发展，无产阶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反而越加贫困。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和科技发展成果，这不仅推动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精神文化的繁荣，而且通过文化和科技成果的交流共享充分激发社会创造力，促进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不断涌现。三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对社会生产进行组织和调控。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意味着改变了资本主义私人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代之以社会化大生产的自觉组织和调控。联合起来的个人能有意识地引导科技发展和文化生产，使之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人的历史主动中，文化和科技达成高度统一。

（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引领文化和科技正确发展方向的根本保证

恩格斯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④ 这表明社会历史发展是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与历史主体的能动性的统一。文化和科技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对立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统一，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也是历史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无产阶级是实现文化和科技统一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现实主体，将文化和科技作为解放自身的重要手段，通过掌握科技来掌握先进生产力、把握社会历史的前进方向，通过掌握文化来唤醒自身的阶级意识、实现无产阶级的联合，在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力量与主观力量的掌握中实现自身解放，并且将文化和科技从资本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使二者在全人类得到解放的未来社会中交汇、融合。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并且“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 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化和科技的统一在共产党这里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

实现文化和科技的统一，在历史主动性方面，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因为消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文化和科技的对立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这一过程中呈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拉锯状态，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② 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客观上推动着资本主义走向消亡，为文化和科技对立的消解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需要共产党自觉自为地进行社会改造，对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方向进行能动的调控，以推动文化和科技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深度交融。共产党在文化和科技融合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效驾驭介入文化和科技发展的资本力量，确保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社会主义方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的“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③ 就包含了对数字文娱领域受“流量为王”的资本逻辑影响而衍生的泛娱乐化乱象的整治。二是掌握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实现积极的意识形态引领，确保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受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高度重视党在文化和科技融合中的领导作用，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④ 这自然也包括在文化和科技融合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6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5页。

四、新时代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理论启示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实现文化和科技融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文化和科技具有内在统一性，这是二者融合的基础。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要实现双向赋能与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仍是重要生产要素，文化和科技的融合需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文化和科技只有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历史前景中才能达到高度统一，因此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一）推动文化和科技的双向赋能与协调发展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看，文化和科技并非相互割裂的两个领域，而是处于有机统一、双向互动的关系中，文化和科技融合是科技变革、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文化和科技融合必须把握二者之间的统一性，以科技创新赋能文化创新，以文化发展引领科技发展，平衡文化和科技融合中的技术属性与文化属性，实现文化和科技的双向赋能与协调发展。一方面，科技发展是文化形态跃迁的强大动力，必须把握机遇，推动文化科技创新，赋能文化创新发展。当前，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推动着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的信息化转型。因此，应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相融合，实现文化发展的数智化赋能，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繁荣数字文化经济。具体而言，既要加强文化科技的研发攻关，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又要积极发挥数字技术对文化发展的赋能作用。例如，通过3D打印、三维扫描与建模修复、AI图像修复等技术手段保护和修复文化遗产，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汇聚、整合和分析文化资源，激发文化创新灵感。

另一方面，文化发展对科技发展具有引领推动作用，应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顺应技术变革，推进文化创新，以先进的文化为科技的发展与应用提供文化支撑和价值引领。当前，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中出现了一些乱象，如生成虚假信息，算法成为制造信息茧房、撕裂共识的工具等，这反映了在文化和科技融合中技术的滥用和文化引领的不足。为此，要加强文化发展对科技发展的引领。其一，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创新，这不仅要求形式载体的更新，而且要求内容的创新，通过这种文化创新为技术变革下社会涌现的新技术、新生活方式提供文化引领。其二，要推动科技人文建设，建设面向技术化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加强对技术研发者、技术使用者的科技人文教育，以人文滋养为科技发展铸魂。其三，要构建普遍认可的科技伦理，加强对科技研发和应用的伦理规范，以减少科技发展的盲目性，引导科技向善。

（二）规范和引导文化和科技融合中的资本参与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科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成为资本增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科技与资本共谋介入文化生产，使文化商品化、技术化。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必须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而“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①因此资本在我国仍将长期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文化和科技融合催生新型文化业态、孕育文化经济新增长点，是当前资本重点关注与投资的领域，新时代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必须规范和引导资本参与。一方面，从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宏观视野看，资本对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当前应充分发挥资本在推动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中的积极作用。要支持民营资本承担重大文化科技攻关任务、加大对文化科技研发的投入，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数字文旅、文化元宇宙等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重点领域，扶持一批民营资本创办的创新型数字文化企业，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科技企业上市融资。

另一方面，要警惕受资本逻辑侵蚀而衍生的文化和科技融合乱象，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当前，在文化和科技融合过程中涌现的短视频、网络直播、数字视听等新型文化业态受到消费主义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流量至上、泛娱乐化、庸俗化等不良导向；科技在文化领域的应用也存在过度商业化、偏重感官刺激、价值观引导偏失等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不足。对此，在数字出版、数字视听等思想舆论重点领域，要完善对文化和科技融合的资本准入审查；要加强对民营资本通过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19页。

文化和科技融合进行内容生产的规范和引导，鼓励创作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数字化内容，限制过度娱乐化、低俗化的数字化内容的生产，禁止错误思潮的数字化传播；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确资本参与文化和科技融合的边界。

（三）坚持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社会主义方向

历史唯物主义指明了实现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科学路径，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产党的领导基础上，使文化和科技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交汇。当前要实现文化和科技融合，就必须遵循这一科学路径，坚持二者融合的社会主义方向。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实现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关键，因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一是增强新型文化业态发展的公共性，加强对文化科技领域新兴企业的市场监管，生产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科技产品。二是通过科技赋能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优化文化科技产品供给，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成果。三是发挥人民在文化和科技融合中的主体作用，鼓励和支持其在文化科技领域的创新创业，同时发挥其监督作用，确保文化科技应用合乎法律、合乎道德、合乎主流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共产党是实现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领导力量，因此在文化和科技融合中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一是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在新型文化业态发展中坚持经济性和政治性相统一，在增强人文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加强对新型文化业态的意识形态监管，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引领，运用数字技术精准识别和打击数字影视、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文化科技产品中可能隐含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分裂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二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既要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使文化和科技融合生产的文化作品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反对过度娱乐化和消费主义，又要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把握文化科技的应用方向，构建文化科技应用的伦理规范，对文化和科技融合施以积极价值引领。

（责任编辑：李润东 何淑萍）